

[德]赫伯特·克拉夫特 著

卡夫卡小说论

唐文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卡夫卡小说论

〔德〕赫伯特·克拉夫特 著
唐文平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夫卡小说论/唐文平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10

ISBN 7-301-02628-5

I. 卡… II. 唐… III. 卡夫卡-小说-研究 N. I516. 074

书 名:卡夫卡小说论

责 任 者:赫伯特·克拉夫特

责任编辑:张弘

标准书号:ISBN 7-301-02628-5/I·2540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2502015 发行部 2559712 编辑部 2502032

排 印 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625 印张 114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6.00 元

目 录

一 长篇小说论.....	(1)
卡尔·罗斯曼的结局	
——《美国》.....	(2)
约瑟夫·K. 之死	
——《诉讼》.....	(14)
K. 之进攻	
——《城堡》.....	(42)
二 短篇小说选论	(69)
自我	
——《乡间的婚礼筹备》.....	(70)
法不一定永远是法	
——《判决》.....	(76)
剥削	
——《变形记》.....	(80)
故乡	
——《在流放地》.....	(87)
尽其职责	
——《乡村医生》.....	(91)
勋章	
——《万里长城建造时》.....	(93)
溜之大吉	
——《致科学院的报告》.....	(98)

艺术	
——《饥饿艺术家》.....	(100)
预感和现实	
——《女歌手约瑟芬妮	
或者耗子民族》.....	(102)
三 译后记.....	(105)
四 附录.....	(117)

一 长篇小说论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美国》、《诉讼》和《城堡》谱写了一个反抗三部曲。^[1]在卡尔·罗斯曼、约瑟夫·K. 和土地测量员 K.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自我意识的美学再现。

卡尔·罗斯曼还完全为外界主宰。他相信世界是好的。他的自我意识仅仅是一种感觉，他感觉到许多发生在他和别人身上的事情都不大正确。

约瑟夫·K. 发展了一步，他已经拥有辨别是非的意识。社会制度对于个人权利的侵犯迫使他产生这种意识。他明白，他必须捍卫个人的权利，而且不仅是他自己的个人权利。

K.，土地测量员，他按照自己的意识行动了。他自己去引发挑起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意在改变那个社会制度。

《美国》叙述的是卡尔·罗斯曼的故事。卡尔·罗斯曼是个孩子，下等人，属于社会中毫无权力的那个阶层，最终竟被称作“黑人”。《诉讼》叙述的是约瑟夫·K. 的故事。约瑟夫·K. 是一个热爱平安的公民，但他正因此而被毁灭。《城堡》叙述的是 K. 的故事。K. 是一个进攻者，他的口号是“以法制反统治”。^[2]小说没有完成，只是一个断篇，它拒绝告诉我们 K. 的结局。

卡尔·罗斯曼的结局

——《美国》

“每当一个浪荡哥儿捣乱作恶，使全家饱尝其苦，不堪忍受的时候，德语国家的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个简单干脆得让人吃惊的办法：把这个败家子打发到美国去，打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那里有绝好的机会，得到能够带来福分的工作；而且美国那么遥远，这遥远的距离可以保护贫穷的家庭免遭败家子的骚扰。”^{〔3〕}这段文字出自埃尔温·罗森 1911 年发表的《德国捣蛋鬼在美国》一书，那是一个“冒失者、堕落的高中生、轻浮的大学生和负债累累的年轻少尉们的美国”。^{〔4〕}在这个美国里，我们是无法找到卡尔·罗斯曼的。小说《美国》描写的卡尔·罗斯曼这个“浪荡哥儿”不是罗森笔下那种人们常见的“浪荡哥儿们”。而小说描写的卡尔·罗斯曼的家庭倒是与罗森笔下那种把败家的“浪荡哥儿”打发到美国去的“贫穷的家庭”完全相同：“17 岁的卡尔·罗斯曼由于受一个女佣人引诱，并同她有了一个孩子，便被他贫穷的父母遣送到美国来了。”（V 7）通过将小说《美国》与罗森的纪实描写《德国捣蛋鬼在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卡尔·罗斯曼这个“浪荡哥儿”与他“贫穷的家庭”的关系有异于罗森笔下“浪荡哥儿们”与他们家庭的关系，即卡尔·罗斯曼虽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浪荡哥儿”，却还是被他的家庭打发到美国去了。^{〔5〕}小说的这一描述使我们看到社会以及社会替罪羊的真实状况。

“这部小说非常庞大，仿佛铺写在整个天空”，（Br 96）它梦想

宽广深远的地平线，并在小说人物身上现实地展现了这种梦想。在往来于汉堡和美国之间的汽船刚刚抛锚纽约港的时候，船上的司炉就对卡尔·罗斯曼说：“Jawoll, Wir maschieren heute ab.”（“没错儿，我们今天就开路。”）（V 12）他把德语的 Jawohl 一词变音为 Jawoll，用具有讽刺意味的复数人称代词“我们”替代单称代词“我”，将自己被解雇美化说成“开路”，这一切都透露出一种逆来顺受者的骄傲，集中体现了个体的历史状况，这种状况在小说第一章《司炉》写成的两年之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得到具体体现：每个人都能“发挥影响……，因为没有民众是无法进行战争的”。（M 307）对于那些同司炉一样具有战争热情的人，或者对于那些被迫接受这种热情的人来说，小说的原标题《失踪的人》完全可以成为他们大旗上更为现实的口号。当然，面对许多无辜者的命运，这个口号只是一种极其婉转的表达方式：他们并非仅仅消失了，他们被惩罚杀害了。

卡尔·罗斯曼只听进了司炉话里的“没错儿”这个词。他天真善良，盲目乐观，雄心勃勃，在船上经历的一切也没有改变他，这一点在下面的文字中表现出来：“一个他在船上曾打过照面儿的年轻人走过时问道：‘喂，您还不想下船吗？’‘我已经准备好了’，卡尔冲他笑着说道，他自我感觉很好，又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便把箱子举到肩膀上。”（V 7）他的言谈举止显得很自信，但却对自己本身没有把握：“他赶紧请求那位看来并不情愿的熟人行个好，照看一下他的箱子，并迅速看清他所在的位置，以便回来时不找错地方，然后匆匆跑走了。”（V 8）有些人从童年时代起就饱受虐待，特别是这种人，他们相信福善会降临他们身上。带着这种期待，他们会变得愉快起来，或者他们会觉得非常自豪，或者既愉快又自豪：弗朗兹·布特鲍姆，卡尔的新熟人，甩晃着他的手杖，（V 7）而司炉则为那艘大轮船感到骄傲。（V 9）然后，大家当然都想找到“自己人”，“‘您是德国人吗？’卡尔想保险一点，因为他已经听说很多危

险的事情,特别是爱尔兰人对新来美国的人最为危险。‘我是,我是’,那个男人说。”(V 19)在这一片刻,他们觉得自己作为德国人不必任人欺侮了:“您瞧,我们可是在一条德国船上。”(V 13)坐在同一条船上,他们觉得十分安全,仅仅两年之后,那些被要求不分派别只做德国人们的人们也有同样的感觉^[6]:卡尔“几乎没有觉得他是在一条停泊异乡港口的摇晃不定的船上,躺在司炉的床上他大有归家之感。”(V 14)一个善于联盟合群的人,世界也得对他另眼看待:“这一切的后面耸立着纽约城,它用无数摩天大楼的窗口看卡尔。”(V 20)这使他这个一无所有者充满自豪:“真的,呆在这个房间里,我知道自己是在哪儿。”(V 20)

在现实中,这种兴奋的感觉可以告诉一个人他是谁,而不是他在哪儿。上面小说的这个情节恰恰与此相反,它揭示了“个体”感情的平庸,因为他感到安全的地方,是一个隐蔽起来的地方,在这里他接触不到现实,所以,他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还很是一个人物。卡尔·罗斯曼 17 岁,约瑟夫·K. 30 岁,土地测量员 K. 30 多岁,(Sch 11)在他们迄今为止的生活中,他们一直受着要适应服从环境的教育,他们自己也努力去适应环境。为了获得或者达到某些东西,他们都被迫或者自愿地服从适应环境。

至于所谓只有那些被称作民众的人才有深层的感情,这是因为,如果仆人们拥有理智的话,他们无法进入主人們的“圈子”,(V 30)在这个圈子里,一个“侍者”可以“用一种像是叙述什么秘密的口气”对“司炉”说:“马上滚出房间!”(V 21)

而用感情取代理智,其结果只能是感情用事,这一点,在乖顺的卡尔·罗斯曼身上表现出来:在参议员雅阁布说出他是卡尔的舅舅之后,“卡尔问道:‘您贵姓?’”,他问得“虽然很有礼貌,但丝毫不激动,努力猜想新出现的这件事儿会给司炉带来什么结果。”(V 36)小说写出卡尔的“努力猜想”,强调了他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无济于事,因为那种以为社会毫无阶层之分,人人拥有平等

权利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当参议员说，他和其他的先生们已经听到“足够，甚至太多司炉的事情”(V 46)时，卡尔回答说：“一件需要主持公道的事情不应该取决于大家是不是已经听够了这件事情呀。”(V 46)

感情取代了理智。这里，感情过于强烈，使卡尔看不到现实，在现实中，获取一个自己本不属于其中的阶层的挂名标签，只是为了得到这个阶层的物质好处。

卡尔·罗斯曼这个人，他是许多人的化身：在进入社会的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那种能够保存自我的爱情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把性生活当作一种暂时摆脱不满足的手段，他们需要的是有点什么东西，而不是有个什么人：“他(卡尔)觉得，她(女佣约翰娜·布鲁姆尔)好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种可怕的急需救助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V 43)

在《城堡》这部小说里，土地测量员 K. 已经找到了证实自我存在的方法：他是“多余的，处处成为他人的障碍”，(Sch 80)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倒下，化成石头进行反抗，即便他最终也没有决心一定要用他那不可移动的体积和重量(SchA 198—199)迫使官方机构行动，但他还是能够以此让“那些官府的人……不情愿……地走来把他搬开”。(Sch 93)相反，卡尔·罗斯曼连反抗的性格都没有。他不敢，也不想反抗，而那位司炉虽然抗拒船长对他的解雇，却没有意识到船长为什么偏偏解雇他的原因，最后放弃了反抗，留下的只是一种固执：“他把双手半插在裤腰带里，他的动作过于激动，裤腰带和带花纹的衬衫一起显露出来。对此他毫不在意，他已经诉说了他全部的痛苦，现在大家还应该看看他穿在身上的破衣烂衫，然后再把他带走。他想，侍者和舒巴尔两人在这里级别最低，他们大概会最后一次向他行这个好。舒巴尔则可以安心了，再不会像总出纳员说的那样担惊受怕了。船长将雇佣清一色的罗马尼亚人，到处

都会讲罗马尼亚语，也许这样一来，一切真的会好起来。”(V 47)

然而，在另外一点上卡尔·罗斯曼与土地测量员 K. 是相同的：他们虽然可以被诱惑，但却不会被诱惑去赞同统治制度。与土地测量员 K. 相比，卡尔·罗斯曼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性格。卡尔的舅舅警告他说“学会明白你自己的地位”，(V 50)这对卡尔毫无作用，相反，他觉得可以利用“他的新地位”去拒绝赞同统治制度。(V 46)当然，卡尔的“新地位”也使他产生了等级思想，由于无知，他常常因此使自己变得可笑，例如小说在描写参议员继续叙述他是如何找到外甥时写到：“司炉唠唠叨叨。”从卡尔·罗斯曼的角度看去，⁽⁷⁾这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V 46)小说第二章的一段描写也让人觉得卡尔十分可笑：“卡尔其实可以同钢琴和搬运工人们乘坐一个电梯，但因为旁边一个专门载人的电梯还空着，他就坐了这个电梯，借助一个摇杆的帮助，他使自己始终与另一个电梯保持同样的高度，透过玻璃墙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那件现在属于他的漂亮乐器。”(V 59—60)这里，钢琴所有者卡尔·罗斯曼的行为还充满了男孩子游戏玩耍的特点；而第三章中卡尔的一段讲话则最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识还远远不是一个财产所有者的意识：“您别以为我现在能够正正经经地挣到饭钱了，上帝保佑我不要用的什么手段去挣钱。”(V 106)除了上帝之外，保护他的还有一种生物本能的同情感，这种同情使他没有理会他舅舅对他发出的“学会明白你自己的地位”的警告，但却不能阻止在小说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失踪了：“司炉似乎真的不存在了。”(V 53)

卡尔·罗斯曼因为舅舅的缘故进入了一个他不想或者说不理解自己在其中地位的社会，然后又被用尽心机抛出这个社会。然而，他并不惋惜失去的一切，正像他当时并不惋惜失去故乡布拉格一样。对于他来说，布拉格不是卫护他的“老母亲”。(Br 14)布拉格和纽约都不属于他，他没有失去故乡，也没有获得故乡，他也不

为自己虚构幻想一个故乡。他面对的是一个让人无法看透、难以捉摸、神秘的物化了的世界：“白天和夜晚，在黑夜的梦中，流动在这条街上的永远是拥挤的交通，从上面向下看，那交通的流体是由不断重新组合和交叉的变形人体和各式车辆的顶篷混合而成，它又制造出各种各样新的由噪音、灰尘和多样气味合成的粗野混合体，所有这一切被一巨大的光束抓捕住，浸透着，无数的物体将这光不断驱散、排开、又重新聚拢，看花了的眼睛会觉得这光仿佛有了形体，好似一块覆盖在这条大街上的玻璃，它每时每刻都不断地被人用力砸碎。”（V 55）这里虽然只显示了反抗的可能性，还没有展示出一种积极反抗的力量（“正在示威的钢铁工人”〔V 74〕对卡尔来说也很陌生），但却使人看到卡尔还保留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让他认识到，那些做着“犯罪般”（V 87）生意的人虽然势力很大，但他们并不可钦，而是可笑。（V 121）

小说第四章的开始写着：“那两个年轻人可能，而且极有可能是旅馆侍员，他们穿着衣服睡觉，一定是要马上起来去招待客人。”（V 129）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所描写的社会等级中，人们总是以一种固定程式化的眼光去看待和理解日常生活现象。而卡尔·罗斯曼的经历却使他破除了常规：“和他们睡在一个房间里采不大体面，但危险也小多了。”（V 129）卡尔·罗斯曼的这种处境在小说的另一个地方也体现出来：“那个时候他还完全可以起誓说，在美国呆上两个月就可以成为美国军队的将军，而现在他实际上与两个穷鬼呆在一个顶楼房间里，呆在纽约城外一个客店里，他不得不承认，这里才是他真正的位置。”（V 135—136）

这个卡尔·罗斯曼，尽管他惶惶不安，犹豫不决，但却有一条不变的准则，即保持人格的完整，保持人格不受伤害。有些被人称之为亲密的东西，对他来说已经超越了界限，损伤了人格：波龙德“用胳膊搂住卡尔，把他拉到自己两腿之间。卡尔心甘情愿地容忍了他的行为，但总的来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年，不应该被这

样对待”。(V 104)卡尔·罗斯曼把这种亲密看作是超越了人格的界限,这也是他在性生活中非常被动的原因:“然后她(约翰娜·布鲁姆尔)也躺到他身旁,想从他那儿听到什么秘密,可是他没有什可告诉她的,于是她半真半假地生了气,摇动他,倾听他的心脏,也让他听她的胸脯,但卡尔没有这样做,她把光裸的肚皮贴到他身上,用手在他的双腿之间寻摸着,恶心得卡尔直摇头,结果头和脖子都滑出了枕头,然后她又用肚皮顶了他几下,他觉得,她好像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阵可怕的急需救助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在她多次表示希望再次相会的愿望之后,他哭泣着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床上。”(V 42—43)这个卡尔·罗斯曼,在寻找那张对他至关重要的父母的相片时,他终于认识到,仅仅怀疑一个人,还不能把这种怀疑当作损伤他私人生活范围的原因,因为“我们终究是人不是小偷”(Br 107):“在搜查胸包的时候,卡尔的手触到罗宾森滚热肥厚的胸膛,这一时刻,他猛然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同伴也许做下了一件非常不公正的事情。”(V 168)

人是可以自由的,卡尔·罗斯曼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后来,偏偏只有他才领悟到,他已经获得的东西并不是他的全部追求:“‘我们(他的同伴们和他)在不和中分手了。’女主厨显然把这当作一件好消息,她问:‘那您就自由了?’‘是呀,我自由了’,卡尔说,他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种自由更没有价值了。”(V 171)卡尔·罗斯曼的这种自由也就是《诉讼》小说里那位乡下人在法的门前获得的自由:只要他们不去行动,不去实现自己的、哪怕是卡尔·罗斯曼那种小小的愿望,他们想去哪儿都可以去哪儿。与《城堡》小说中的土地测量员 K. 一样,卡尔·罗斯曼虽然本不想接受一个他不熟悉的工作,但也开始寻找“一个立足之地”,最初这是女主厨的建议,(V 171)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立足的必要性:“干什么种类的活儿,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能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V 408)当然,与土地测量员 K. 一样,在每天每日寻找更

好机会的道路上，他再也不能够向前发展了。那些由于社会的竞争原则总是伤害自己危害同阶层同胞的人永远不会向前发展了：“他（卡尔）也有可能通过拉动一根穿过电梯的牵引绳加快电梯的速度，但这是电梯行驶规则禁止的，据说也很危险。当电梯里有乘客时，他从不去动那根牵引绳，可当他在楼上送走乘客，到下面等待其他乘客的时候，便无所顾忌，像水兵一样很有节奏地上下拉动牵引绳。再说，他知道其他管电梯的男孩儿们都这样干，他不想让他们把自己的乘客赢走。”（V 188—189）只要生产商品的社会存在，那些接受认可其物化原则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向前发展了，“机会好的时候，卡尔会被使用，会被客人从房间打发到餐厅或者赌厅办事。（V 190）还有那些没有找到自我的，只能接受使用他们雇主身分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向前发展了；“他（卡尔）觉得自己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位，这个位置给予他各种权利，西方旅馆是一个不能小看的顾客。”（V 195）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常常由于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些人便不能向前发展了，尽管他们有时也用不高的声音说起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是有错的’，卡尔说完停顿片刻，似乎期待他的法官们说一句客气的话，好使他有继续辩护的勇气，但是谁也没有说话，‘我只错在把那人带到睡房去了，他叫罗宾森，爱尔兰人。他所说的其他的一切，都是酒后之言，全不是真话’。”（V 243）卡尔被怀疑偷了东西，他为自己作了辩解，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被解雇以逃避法庭的追究。（V 251）

他获得这个逃跑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人在不幸之中还有万幸，而是因为命运相同的人们已经开始团结起来：“卡尔很幸运，他是在一个工人居住区被追捕的，工人们不是站在官府一边。”（V 283—284）但是，这种情况和经历只是个别的，一旦卡尔不再感到存在着威胁他生命的危险，他就会忘记这次经历。体制只要向个体展示提供一个极小的上升或者至少能够让他活下去的机会，或者能够

让他生发出对这种机会的幻想，那么现存的制度便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学生约瑟夫·门德尔的经历就是一例，(V 347—349)而出身低层的卡尔·罗斯曼的经历则更为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假如卡尔能够在一个事务所谋到这样一份职位，他就会全身心投入他的工作，抛开其他一切，他也不会像那个大学生一样无端消耗精力。如果工作需要，他也会将晚上的时间用来为事务所工作，这也是人们在他开始做商店学徒时会对他提出的要求。他会只想着他为之服务的公司的利益，接手所有的工作，即使那些别的职员认为有伤其身分的工作，卡尔也会干。”(V 353)

困境中滋生信仰。人的期待越是不可兑现，这种信仰就越强烈。在“俄克拉哈玛”的大戏院里，希望和恐惧被公开展示出来；圆形广告柱上张贴着《新约》题材式的图画，透露着荒谬；而那个被寻找到的“美丽非凡的地方”(F 302)也只是一种俗气虚假的象征：“俄克拉哈玛的大戏院呼唤你们！它只在今天呼唤，只有一次！”（也就是说，谁要是不去就会错过时机。）“憧憬未来的人都属于我们！”（如果看看这种不断将自身转让给外人的狂热精神，我们简直可以觉得还从未有人思考过自我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一个大家共有的群体需要的不是外来的证实，它需要的是它自己。）“我们诅咒那些不相信我们的人！”(V 383)（为什么信是一件善行，不信是一件恶行，为什么前者得到天堂的奖励，后者受到地狱的惩罚，这些问题神学家也许可以解释清楚；但是尘世中对提出疑问的怀疑者作出判决，这完全是维持现存统治的一种手段，历史和社会经验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俄克拉哈玛”戏院的思想世界与积压在商店里卖不出去的商品并无两样。

在“呼唤”、“欢迎”和“诅咒”之后，他们还没有忘记所谓“予以承认”的形式：“谁决定加入了我们的戏院，我们在此马上向他表示祝贺！”(V 387)没有这种形式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因为每个人只能从外界获得信仰的能力。小说透彻地揭示了这种招工生

意实用主义的、蔑视他人乃至采取欺骗手段的实质。在被录用者的一位代表讲话表示感谢的时候，人事处的头头根本不听，早已转身向“装运队队长发出各种指令”。（V 415）

理智使人问心有愧，从卡尔·罗斯曼的视角看，这种扪心有愧的心理中还包含着抵触的情绪：“没有人再相信招贴广告了。”（V 387）但是，如同在举行招收职员“克拉同”这个地方一样，良心无论在哪里都不能阻挡社会中的弱者与统治者达成协议。一旦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地会被雇佣（他还未被真正雇佣，因为在俄克拉哈玛还要进行复核。〔V 409〕）那个想要寻找一个像样前途的人便觉得自己有了保障，他便会就招贴广告上的“大话”和“谎言”发表自己的意见。（V 388）我们可以相信 17 岁的卡尔·罗斯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企业仅仅为了获得雇员要这样大张声势”，（V 389）正是这一点揭示了艺术形象与现实的差异，在现实中，没有人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想相信）招收雇员本身就是最终目的，人们非常清楚雇员是有什么用处的。小说的手稿上原来写着：“没有人想成为艺术家，但人人都想生活。”（VA 256）^{〔8〕}后来被改为：“没有人想成为艺术家，但人人都想为他的劳动得到报酬。”（V 388）这一改动清楚地说明，人本身已经发展到了不再把自己的愿望看作是生活内容的地步，他关心的是付报酬的工作，似乎这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

因为“大的东西”往往能够使人盲目，使人失去清醒的意识，因此“高”、“宽”、“多”便成为招徕的手段：“想想吧，我们在所有的城市都要录取人员，我们的广告队伍不停地周游各处，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广告队伍。”“难道戏院还没有开张吗？”卡尔问道。“哦”，芳尼说，“那是一个老戏院，可它在不断地扩大。”……“为什么你们在赛车场上招人呢？”“对”，芳尼说，“我们到处都做好最大的准备等待最大数量的人前来应招。赛车场地方很大。”（V 394—395）那么这一切费用怎么支付呢，卡尔·罗斯曼又问道，芳尼答道：“这根

本不用我们操心。”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类似的问题还未被提出，答案就已经有了。有些人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戏院招收人员，但很快他们便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人事处的头头说：“‘我们当然得知道他以前干过什么职业，这样我们可以把他放到能够用上他知识的地方。’‘这难道不是戏院在招收人员吗？’卡尔疑虑地想着。”（V 398）可是那位试摸着他的胳膊的先生像评估一个奴隶一样打量着他：“您有劲儿干重活儿吗？”（V 408—409）在录取室里，卡尔发现那位头头与他在欧洲家里的学校校长长得非常相像，这使他大吃一惊。这是艺术对现实制度的表现。

他们，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乘坐“两天两夜”火车（V 418）到“俄克拉哈玛”去，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只有现在这一次，他们觉得自己被人正经看待了，至于以后他们会怎么样，这无所谓了；（V 428）他们，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他们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变样了：“这里聚集的肯定都是没有任何财产的人，他们受到的却是这么好的接待和关照！”（V 416）

他，卡尔·罗斯曼，在经过各种审核后终于也属于其中，他“沉默地忍受了一切”，（V 418）因为大的事情毕竟存在，他现在就已经有了希望；他坐在火车里，车窗外是巨大的美国，（V 418）环绕着他四周的是充满魔力的机会，他要到那里去。“卡尔·罗斯曼”是他以前的名字，现在，他，这个行进在去往“俄克拉哈玛”路上的人，称自己为“黑人”，这个名字填补了“失踪的人”留下的空缺。卡夫卡曾经使用霍利琪《美国的今天和明天》作为参考资料，该书《黑人》一章写道：“一个白色皮肤的美国人，他站在法官面前，只要他的犯罪行为没有被证实无疑，他便是无辜的。而一个黑人，如果他不能清白地证实他是无辜的，那么他便是有罪的。在南部和中部的各州，勿需许多公文手续，一个黑人就会被挂到就近的树枝上被枪杀或者烧死，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怀疑他犯了罪，或者仅仅是因为人们又想再次看看人血、闻闻人肉味”，“上帝保佑”，霍利琪讽刺评